

《长恨歌》文本结构与哲理意蕴新探

李亦辉,李秀萍^①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048)

[摘要] 《长恨歌》的文本结构可以划分为表层、中层和深层三个层面。表层结构是文本的时空构成,中层结构是作者的情感脉络,深层结构是政治与爱情的矛盾冲突。爱情与政治的两难,既是《长恨歌》文本的深层结构,也是《长恨歌》深层哲理意蕴之所在。这一两难结构的实质是人类自身的情感与理智的冲突,这一冲突的结果则是真正悲剧的诞生。

[关键词] 白居易;《长恨歌》;文本结构;哲理意蕴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9)02-0083-03

—

关于白居易《长恨歌》的主旨,一向众说纷纭,检讨学术界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三说,即讽喻说,爱情说,爱情、讽喻双重主题说。三说以何者为是呢?我们不妨回到源头上,看看白居易本人的观点。

先看陈鸿《长恨歌传》结尾处关于《长恨歌》主旨的一段话。这段话据《丽情集》所载是:“嗟,女德,无极者也,死生,大别者也”,“生感其志,死溺其情”^[1]。而《长庆集》所载则与《丽情》本迥异:“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2]陈寅恪先生“颇疑丽情本为陈氏原文,通行本乃经乐天所删易”^[3]。《丽情》本矛头所向是玄宗,《长庆集》本指责的是杨妃,二本所言主旨同为讽喻,没有质的差别。但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一条结论,即《长庆集》本《长恨歌传》所谓的“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正是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意旨所在。由是观之,则《长恨歌》的主旨当为讽喻了。

再看另一条证据:“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4]这是白居易在编集自己的诗集时颇自得之情的两句诗,其中“风情”二字,持爱情说者多解作“风月之情”,持讽喻说者则解作“风诗之性情”或“国风之情”。我认为解作“风月之情”较为恰切,证据之一是白居易在给自己的诗歌结集时,把《长恨歌》编入感伤诗中,而并不归入讽喻诗内。证据之二是《与元九书》中的几句话:“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5]我们知道,白居易《与元九书》所倡导的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实用主义文学主张,“所重”的是达“兼济之志”的“讽喻”诗和阐“独善之义”的“闲适”诗,“所

轻”的是杂律、感伤诗;白居易把《长恨歌》归入“所轻”者的行列,显然未把它看作讽喻诗乃至闲适诗。如果上面的说法能够成立的话,那么《长恨歌》的主旨又当是言“风月之情”即爱情了。如此看来,连白居易自己对《长恨歌》主旨的看法也是矛盾的。

既然从作者那里也得不到关于《长恨歌》主旨的确切答案,那就只有求教于文本自身了。细观《长恨歌》全篇,我们会发现《长恨歌》主旨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与其结构复杂性相关,因此解读《长恨歌》的文本结构对于破译《长恨歌》的主旨及其深层哲理意蕴就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

二

我们可以把《长恨歌》的文本结构划分为表层、中层和深层三个层面。

《长恨歌》文本的表层结构是指文本的时空构成。依据《长恨歌》的时空线索,我们可以把全诗分为三个大的段落:第一段,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时间是“安史之乱”以前,空间是唐都长安;第二段,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夜雨闻铃肠断声”,时间是“安史之乱”中,空间是玄宗“幸蜀”的途中;第三段,从“天旋日转回龙驭”至全诗结束,时间是初步平乱之后,空间是唐都长安。这条时空的线索处于《长恨歌》文本的最外层,是显而易见的。

《长恨歌》文本的中层结构是指文本的情感构成,也即作品所蕴含的作者情感的脉络。较之《长恨歌》文本的时空线索,情感线索要相对深隐一些。细读全诗,《长恨歌》中有三句诗值得我们特别注意,是把握作品情感脉络的关键。

第一句即全诗开头的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这一句看似起得平常,实则大有深意,是开宗明义,定下讽喻的基

[收稿日期] 2009-01-12

[作者简介] 李亦辉(1974-),男,河北景县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黑龙江科技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调。“汉皇”指汉家皇帝,此处借指玄宗,以汉喻唐,是唐诗中常用手法。“重色”二字,深含贬义。作为一国之君,“重色”就意味着荒淫无道,纲纪崩坏,这是历代诗人和读者心中的不言自明的定式。“思倾国”中的“倾国”语义双关,既指绝色女子,又暗示了“汉皇重色”所导致的国家倾覆的后果。

第二句是“花钿委地无人收”一句。从叙事的角度来看,《长恨歌》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的客观的叙事角度,作者尽力保持叙事的客观、冷静,通过景物和人物形象来传达自己对事件和人物的看法;只有极不明显的几处,作者从故事中站出来,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花钿委地无人收”一句便是第一处。透过“无人收”三个字,我们可以隐约地感觉到作者面对杨妃悲惨的死亡,内心深处产生的巨大的同情。如果把“汉皇重色思倾国”一句作为“定调”的话,那么“花钿委地无人收”一句则可目为“变调”。此前的叙述是客观的,满含讥讽的,此后的笔墨则是饱蘸同情的,赞美的。

第三句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是全诗的结句,同时也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的叙述者的声音,较之第一次的隐约细微,这一次的态度要明朗得多了,是感其不平而发自内心的慨叹,表达了作者对人间美好情感不能久长的憾恨。作者写到这里,已经完全由开始时政治的讽喻的精英的立场转变到爱情的同情的民间的立场上来了。如果说全诗的第一句是“以讽起之”的话,那么这最后的一句则是“以情结之”,是再一次“定调”,作者的情感态度转到了与初始时截然相反的方向上来。

综上所述,我们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长恨歌》具有讽喻、爱情双重主题的结论了。但我们的探讨不能仅止于此。事实上,虽然在《长恨歌》的创作过程中,由于作者情感态度的转向,造成了主旨的前后矛盾,但就整个文本而言,前后却并不是分裂的,而依然是一个完满自足的有机整体。通过对《长恨歌》文本深层结构的分析,我们会发现《长恨歌》更深隐也更深刻的哲理意蕴。

三

《长恨歌》文本的深层结构是“政治”与“爱情”相互矛盾冲突的两难结构。

运用分析的方法,我们可以在《长恨歌》文本的深层找到两条结构全诗的线索,一条是政治的线索,一条是爱情的线索;而从文本整体来看,这两条线索既是矛盾冲突的,又是水乳交融的。《长恨歌》的深层哲理意蕴正隐藏在这个政治与爱情相互矛盾冲突的两难结构之中。

根据上述《长恨歌》文本四条结构线索的内在联系,我们可以列出下表:

时间空间	乱前 / 长安	乱中 / 蜀中	乱后 / 长安
情感态度	讽喻	由讽喻转向同情	同情
政治	治世	乱世	治世
爱情	发展 / 性爱	毁灭 / 转折	发展 / 情爱

我们首先会发现,在“安史之乱”前的治世中,李、杨的爱情从无到有,从静止到行动,从权色组合到两情相契,各个方面都处于主动和发展中;在“安史之乱”中,李、杨的爱情则从各个方面都受到阻遏和摧残;在初步平乱后的又一个相对的治世中,李、杨的爱情从思想和行动两个方面再次得以进一步发展和升华。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一个“治世”到第二个相对的“治世”之间,有一个“乱世”,而造成这个乱世的原因,从文本传达的信息来看,正是玄宗的沉湎声色、穷奢极欲、不理朝政。

从上述显明的对应关系中,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三条中国民众心中固有的政治观念:其一,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贪恋女色是国家丧乱的根源。其二,昏庸无道的统治者必然会因其昏聩而自食苦果,遭到报应。其三,在治世中,爱情可以稳定、发展,并付诸行动;在乱世中,爱情也将失去屏障,无所附丽,遭到无情的摧残。显然,前两条都是从道德的角度评价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虽有偏颇之处,但在民众心中却是真实存在的。最后一条则揭示出古已有之的扎根于每一个国人心中“国家至上”的观念。这种观念,向上可以溯源到战国时代屈原的《离骚》,向下则可以在清人孔尚任的《桃花扇》中找到明确的注脚,是中国民众显意识中特有的家国观念的反映。

我们再以爱情线索为主,进一步结合文本分析上表。

在《长恨歌》的第一个时空段落中,李、杨的爱情形成于政治,依附于政治,是权与色的组合。权力是李、杨爱情发生的第一要素。“御宇多年求不得”,可见其寻求之“苦”。以何求之?无疑是其作为皇帝的特权。“一朝选在君王侧”,可见其选得之幸。以何选之?还是其作为皇帝的特权。至于其“春寒赐浴华清池”、“承欢侍宴无闲暇”、“玉楼宴罢醉和春”、“缓歌慢舞凝丝竹”等骄奢淫逸的生活所依恃的经济基础,其“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等泽及家族的巨大封赏的获得,无一不来自于玄宗作为一个封建皇帝的特权。而杨妃之所以受到格外的恩宠,主要是因为她“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天生丽质”,即美色。至于其赐浴承恩、侍宴无闲、金屋侍夜,以至于“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无不是以其美色博得玄宗的恩宠。在这一阶段,李、杨爱情的性质是性爱,而非情爱。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其一,这一阶段李、杨的爱情是建立在政治特权的基础上的,是权与色的组合,缺少共同的思想基础与情感基础;其二,玄宗凭借政治特权给予杨妃及其家族超乎寻常的恩宠和封赏,这表面上使李、杨的爱情呈现出“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盛,而实际上则是对真正爱情的亵渎。

在《长恨歌》第二个时空段落中,李、杨的爱情毁于政治;同时,在世俗之爱的毁灭中又孕育出精神之爱的萌芽。“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一阶段一开始,作者就把政治与爱情的尖锐对立推到读者的面前,为后文埋下伏笔。“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造成李、杨二人生离死别的,不是门第出身的差异,不是金钱富贵的诱惑,也不是二人情感的破裂,而是因为政治——他们曾赖以建立起令世人艳羡的爱情,如今又把他们爱情毁于一旦的政治,

我们先以政治线索为主,结合文本来分析上表。

最后毁灭他们的爱情的恰恰是他们的爱情曾经依恃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悲剧所在。“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不忍割爱又欲救不得,亲睹杨妃之死的玄宗悲痛至极,眼中不但流泪,而且流出了鲜血;此时这一悲痛欲绝的玄宗形象,正是作者创作态度突转后对李、杨爱情悲剧的同情心理的反映,也为后文玄宗对杨妃的思念及他们爱情的升华作出铺垫,埋下伏笔。“蜀江水碧蜀山清,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蜀地的清山碧水,夜月铃声,本都是极美好的景物,但在玄宗恨重愁深的眼中,都一一染上了悲哀色彩,从中我们也开始看到了真正爱情的萌芽。

在《长恨歌》的第三个时空段落中,李、杨的爱情最终超越了政治,超越了世俗的功利,超越了人间的生死,由性爱升华为情爱,具有了唯一性和不可代替性。在这一阶段,玄宗失去了往日显赫的地位,洗尽了游冶无度的奢华,满怀着无望的相思之苦。由春入秋,自昼及夜,故都长安的一人一物、一草一木,都令他触景伤情,睹物思人,备感惆怅。作者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了玄宗对杨妃的深情眷念和苦苦追寻。“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能来入梦”,既然梦中相会的愿望都不能实现,于是请来“临邛道士鸿都客”,希望能以自己的“精诚”招至杨妃的“魂魄”。方士在“上穷碧落下黄泉”后,终于在海上仙山中找到了杨妃。作者通过“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揽衣推枕起徘徊,珠帛银屏迤迤开”,“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玉容寂寞泪痕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晨雾”等一系列心理、动作、形象的传神刻画,衬托出杨妃对玄宗的深切思念。“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既是对玄宗“精诚”的回复和宽慰,也表明了杨妃对爱情的执著与乐观。“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本是“安史之乱”前李、杨在“七月七日长生殿”中宣誓永不分离的定情之语,作者却使之在全诗即将结束时出现,这是大有深意的。一方面,这句誓言的重述把全诗的情感推向最后的高潮,在读者心中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达成对李、杨爱情的最终认同;另一方面,虽是同一句誓言,但在“安史之乱”后说却与在“安史之乱”前说意义有所不同,在“安史之乱”前那样沉湎声色、太平无事的处境下,这样一句誓言也许只具有情场甜言的喜剧效果,而在经历了生离死别、天壤悬隔后重述这一誓言,就具有了动人心魄的悲剧力量,昭示了爱情对于政治权力、现实功利与人间生死的最终超越和最后胜利。

通过对《长恨歌》爱情线索的分析,我们可以归结出多数中国民众对于爱情的信念:真正的爱情可以超越政治、超越功利、超越生死,可以永恒不朽。这是潜存于中国民众意识深层的“爱情至上”观念的反映,表现了人们对生死不渝的美好爱情的渴望,也表达了人们希望真挚的爱情能够天长地久、永无绝期的美好理想。

可见,虽然《长恨歌》文本深层存在着“国家至上”与“爱

情至上”的冲突,但终究是爱情战胜了政治,至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爱情超越政治”一类的结论了。但是作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因为还有最后一句诗没有分析,而且恰恰是关乎宏旨的非常重要的一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句诗,非但直切题目,点明了该诗的主旨,同时也一语道破了隐含于文本深层的哲理意蕴。在《长恨歌》的第三个时空段落中,玄宗以自己的“精诚”打通了人仙之间的阻隔,得到了关于杨妃的消息;杨妃坚信“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重述旧誓,表明自己对爱情的忠贞。故事发展到这里,似乎终于有了一个美满的结局。但事实上,这样一个美满的结局,只是富于同情心的诗人为我们创造的一个虚幻的理想性的艺术空间。杨妃将长眠于地下,玄宗也将愁怨终老,在现实中,政治与爱情的矛盾并没有被真正化解。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事实,谁也无法解决的矛盾。作者深明这一点,所以在收束全篇时,以一个“恨”字出之,为美好的爱情在现实中的毁灭深表自己的同情与不平,为李、杨因天地悬隔而永无再会之期深感憾恨。

综上所述,爱情与政治的两难,既是《长恨歌》文本的深层结构,也是《长恨歌》深层哲理意蕴之所在。爱情与政治在《长恨歌》中,在其李、杨故事中,以至于在所有与李、杨故事相类似的人类生存境遇中,都是一种两难、一种悖论,是与人的存在相始终的、人类自身永远也无法圆满解决的永恒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实质是人类自身的情感与理智的冲突。正如黑格尔在讨论悲剧时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两种“永恒正义”的力量的冲突:两种对立的理想或“普遍力量”都带有理性或伦理上的普遍性,都是正确的,但在特定的情境中,某一理想的实现就要和它的对立理想发生冲突,破坏或损害它,所以他们又都是片面的、抽象的,不完全合乎理性的^[9]。这是成全某一方面就必须牺牲其对立面的两难之境,这种两难与冲突的结果则是真正悲剧的诞生。

[参考文献]

- [1] [宋]李昉.文苑英华:卷794[Z].北京:中华书局,1966:4202
- [2] [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四部丛刊本)[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 [3]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44
- [4] [唐]白居易.编辑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十二[A].白居易集:卷16[C].北京:中华书局,1979:349
- [5] [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45[C].北京:中华书局,1979:962
- [6]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504